

主 编 / 王荣华
副主编 / 黄仁伟

中国与世界： 和 谐 和 平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Second World Forum
on China Studies

文史哲卷

学林出版社

主 编 / 王荣华
副主编 / 黄仁伟

中国与世界： 和 谐 和 平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Second World Forum
on China Studies

文史哲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世界:和谐 和平: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文史哲卷/王荣华主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6

ISBN 978 - 7 - 80730 - 549 - 1

I. 中… II. 王… III. ①汉学—文集②文史哲—中国—文集 IV. K207. 8 - 53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8999 号

中国与世界:和谐 和平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主 编——王荣华

副 主 编——黄仁伟

责任编辑——乐惟清

特约编辑——张龙华

封面设计——王国樑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130

字 数——180 万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30 - 549 - 1/C · 18

定 价——(全三卷)20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编 委 会

主任:王荣华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明华	左学金	孙 颛	吕 贵	刘世军
刘 华	李友梅	李 琪	张济顺	张曙光
何建华	沈国明	何勤华	陈 昕	陈燮君
周汉民	周家伦	周锦尉	郑成良	洪民荣
俞新天	胡劲军	莫建备	奚洁人	秦绍德
谈 敏	黄仁伟	童世骏	裘 新	熊月之
潘世伟	薛沛建			

[编者说明]本卷主要收录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提交的关于文学、历史、哲学以及与之相关主题的论文，其内容涵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中的和谐传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城市发展等等。其中，本卷所选论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和谐发展等问题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理解和诠释。值得一提的是，英文论文部分还收录了海外中国学研究著名学者杜维明、傅熊的论文，他们在论文中也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有益观点。

目 录

儒家“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基本价值观念在创建和谐世界

- 中的普世意义 吴 光 (1)
实证主义与近代中国 何锡蓉 (10)
论中西哲学的会通 俞宣孟 (26)
论中国古代哲人的生存智慧 郭齐勇 (51)
世界视野的中国参照与人类文明和谐发展

——以蒙田、伏尔泰等思考中国为例 钱林森 (66)

“文化自觉”与“全球化”发展

- 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再阐释 方李莉 (82)
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理论的历史借鉴 周山 (96)
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之影响 汪朝光 (113)
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 郑师渠 (123)
从“迁厂逃资”的沪商到“戒急用忍”的台商:以 1949 年以后迁
台的上海企业家为例 谢国兴 (148)
公共空间与大众文化:以近代成都少城公园为例 李德英 (182)
《申报》与海派京剧 姚小鸥 (194)
西方人对中国开封犹太人的调查始末 耿昇 (207)
“Who Are We? And Where Are We Going?” Liu Changyuan & Wang Song (235)
Buddhist Refugee Relief Activism in Wartime Shanghai,

1937 - 1945	Jan Kiely	(253)
The March of the Chinese Spirit	Tran Van Doan	(306)
Tradition,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	Vincent Shen	(336)
Eternal Peace-Eternal War: Some remarks on Kant,		
Heraclitus and Sunzi	G. Wohlfart	(372)
Why <i>Gongfu</i> , and Not Just Action, or Worse, Only		
Theory?	Peimin Ni	(387)
Non-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in China from 1901 to		
1949	Lucien Bianco	(414)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inology in		
Europe	Bernhard Fuehrer	(448)
The <i>Analects</i> of Confucius	Tu Weiming	(467)
Man and Nature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Some Reflec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un-chieh Huang	(489)
From Moral Harmony to Global Peace: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Chung-ying Cheng	(522)
Urban Integration: Midsize Cities in the Lower		
Yangzi	Xin Zhang	(561)
Fashioning a New Psychology	Michael Harris Bond	(591)
Cosmopolitan Patriotism: Containing the Will to Power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laes G. Ryn	(611)

儒家“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基本价值观念在创建和谐世界中的普世意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吴光

内容提要:儒学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思想贡献。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价值观体系,这个观念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表述不尽相同,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提出并确立起来。先秦儒家提出了仁、义、礼、知、圣、中、和、诚、信、忠、恕、恭、敬、宽、敏、惠、温、良、俭、让、善恶、廉耻、中庸、仁民、爱物、民贵君轻等诸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有道德的,也有伦理的、政治的。从一般意义而言,儒学的价值观体系是道德、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但儒学在本质上并非是以伦理为本位的伦理哲学,或以政治为本位的政治哲学,而是“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儒学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是道德之“仁”——一种内在于人心的心理自觉,而儒家所重视的“礼”则是“仁”的外在体现,是用以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的礼仪、习俗与制度。二者的关系是“仁本礼用”或“仁内礼外”。

构成儒家“道德人文主义”哲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所谓“仁爱”,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贯彻普遍的仁民爱物精神。“和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儒家一向重视“和而不同”、“和为贵”。“太和”是最高的和谐境界。“诚信”体现了实

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礼、守法的精神。“诚信”之德，既是立身之本，也是立业之本，立国之本。所谓“中庸”，其实就是“用中”，即推行“中道”，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体现了公正、务实、协调精神。这是一种辩证的、和谐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

儒家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基本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性的意义，成为全人类都能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儒家的“仁爱”观念，不仅在中国与东亚发展出了从民本走向民主的人文精神，而且可以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观念相互接轨与融合；儒家的“和谐”、“中庸”观念，在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并进的世界尤其具有实用性与普世性，是化解矛盾冲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强大思想工具；儒家的“诚信”观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信用机制方面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在承认基本价值观念普世性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同其他文化传统一样，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只能扮演其多元文化结构中的一元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以为中国强大了就可以在 21 世纪实现“中国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化世纪论”或“东方文化世纪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自从孔子奠定儒学的理论基础、创立儒家学派以来，经过历代大儒的阐明与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儒家价值观的观念体系，这个观念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那里表述不尽相同，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提出并确立起来。

例如在孔子那里，谈得最多也最受重视的是仁与礼。但他也多次论及义、知、圣、和、忠、恕、敬、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中庸等价值观念。孟子讲得最多的是仁、义、礼、智，但他也多次阐述了恻隐、恭敬、辞让、善恶、诚信、良知、民贵君轻等价值观念。而自汉唐至明清长达二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基本上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三纲五常”，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仁义礼智信”。然而在君主专制社会里，实际上只注重于贯彻“三纲”，而没有真正地落实过“五常”之道。

经过近百年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批判旧文化”之后，人们对

儒学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彻底的审查与反思，进行了一番“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辨别”工作。但儒学中真正精华的东西是什么？大多数人都不甚了了。且不说那些把新儒学说成“文化保守主义”必欲“绝其道”而后快却不知儒学“精华”为何物的人，就连某些自以为是“新儒家”的人，也不甚了解儒学“精华”到底是什么，而在那里大喊“三纲五常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奢谈什么“以纲常伦理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却不了解伦理与道德是有根本区别，传统儒学的“纲”与“常”也是有本质区别的。本文试图站在现代价值取向的角度来审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一、儒学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答“儒学是什么”的问题，即必须给儒学以适当的定位。

有人将儒学定位为“伦理本位主义”或“泛道德主义”，我是很不赞同的。我在 17 年前出版的《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一书中就批评过这些偏见，而把儒学定位为“确立普遍内在的人类道德主体性同时极为重视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肯定因而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① 我之所以要对儒学作这样的定位，是因为我认为儒学尽管重视外在的人际关系之理，但在本质上是道德的、人文的，而非伦理的。在儒学系统中，伦理讲的是外在的人际关系秩序（所谓“伦者，序也”）。道德则是一种内在于人的心理自觉，是发自内心的东西（所谓“为仁由己”），如三纲五常是伦理，仁、义、忠、信，温、良、恭、俭、让等等是道德。

如果我们承认儒学在本质上是“道德人文主义”哲学，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并不在于“三纲五常”，而在于儒学“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精神。在我看来，构成这一道德人文精神的

^① 详见拙著《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自序》，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 1989 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1990 年版，第 4 页。

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四大范畴。

所谓“仁爱”，按照孔子、孟子的说法，就是“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普遍的仁民爱物精神，由此而发展出从民本走向民主的人文精神。像明清之际文学家张岱说的“予夺之权，自民主之”，^①像同时代的思想家黄宗羲说的“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②思想，就是先秦儒家“仁爱”精神的发扬光大，是朴素民主思想的体现。

“和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的共生、共处、共荣的精神。这是对人类社会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人类永续性发展的生态需要。《礼记·礼运》宣传的“大同”理想，实质上是提倡“多元和谐”的“太和”社会理想。因为儒家一向是重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所谓“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境界。正如《礼记·中庸》所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诚信”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礼、守法的精神。“诚”指的是真实无妄，“信”就是守这个“诚”。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而以“信”为德目之一，并且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诚信”之德，对个人而言是立身之本，对企业而言是立业之本，对国家而言是立国之本。“民无信不立”，指的就是当政者要取信于民，才能成就大业。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实事疾妄”命题^③就是典型的实事求是、批判虚妄的诚信思想。

所谓“中庸”，其实就是“用中”，即推行“中道”，强调的是不走极端，体现了公正、务实、协调的精神。这种思想极为高明，走的是“执其两端，用其中”的道路，是一种辩证的、和谐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

二、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普世性

现代社会一方面享受着科技文明，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许多

① 张岱：《四书遇·孟子·丘民》，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2 页。

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③ 王充：《论衡·对作》，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弊病。随着科技的发展，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在威胁着人类。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是困扰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大问题，特别是当今的中国，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已经是一个危及国民健康的严重问题（据《文汇报》报道，上海疾病控制中心的监测数据表明，上海现患癌症人数竟有134 873人，占上海人口的1%）。物质生活富裕的另一面是享乐主义、物欲横流，而市场竞争的另一面则是拜金主义、人际关系的冷漠紧张与人性的扭曲和沉沦。崇尚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另一面是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形式主义的滋长泛滥，对道德教育和人格修养的忽视与贬斥。

这么多弊病如何解决？靠科学？靠法制？这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是需要精神的处方。现代社会正在重新呼唤儒学，呼唤仁爱、和谐、诚信、节俭、中道、团队精神等等传统美德。

当今的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趋同化的进程之中，一些原本属于西方或东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跨越文化的国界而日益为全人类普遍认同、接受。如原本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现在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被全人类所认同。而根植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价值观念，经过数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被证明是有利於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当然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性的价值。而在当代中国，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进展，使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和平崛起”，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正日益显示出它的普世性价值。由于儒学本身的人文性、实用性特点，正日益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重视，并为现代人类所接纳，成为全人类都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

三、儒学如何参与和谐社会的思想建设

如上所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进取精神与宽广胸怀，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和平与发

展的中庸哲学。这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所需要的思想理论。

一个和谐社会，固然需要政府、军队、法律与科技，需要先进生产力的支撑。但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人的素质高低决定着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也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人的素质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人先天的生理素质、智商水平和后天的文化素质决定的。这后天的文化素质包括了受教育程度、知识积累程度和道德境界的高低。一个和谐社会是否能够建成并得以持续发展，关键是要有高素质的人群作为社会的主体。而高素质人群的培养不仅需要科学知识的灌输、法律意识的培植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磨练，而且需要通过道德教育使之明白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需要经过自我修养不断完善道德人格，提高道德境界。儒学在培养人的文化素质、完善道德人格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和丰富的资源。这特别集中地体现在《礼记·大学》所记载的“大学之道”中。这个“大学之道”被南宋大儒朱熹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个“三纲领、八条目”，是“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①用现代通俗语言来解释，儒家培养人才之道的根本要义是倡明道德、重视民心、归于高尚的道德境界，其成就完善人格的途径是了解事物规律、学习各类知识、修身养性、完善人格从而推及于完成治理家国、安定天下的政治任务，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修身”即自觉提升道德境界为根本前提的。由此可见，儒学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家庭和睦、国家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而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前提是培养有知识、有道德的人。这对我们在当代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是有启示意义的。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文明有礼。儒家历来提倡天地之间人为贵，主张社会以人为本、国家以民为本。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发言权。

^① 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7页。

在现代社会，儒家的民本思想必然能与现代民主思想相接轨，从而推动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和张岱“予夺之权，自民主之”的思想主张，就是从反思与批判君主专制弊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带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新民本思想，曾被清代御用文人李慈铭之流所诋毁，却被近代维新派学者谭嗣同、梁启超等当作倡导民权共和的大旗，又被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侯外庐等誉为“早期民主启蒙”思想是不足为怪的。它说明，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是可以转化为民主思想资源的。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继承与发扬儒家的仁爱、民本思想以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恰恰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色。

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相处、解决好自然资源的保护与适度开发利用的问题，这是确保自然资源不致枯竭、人类得以永续发展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方面，西方科技文明中“征服自然”的口号，中国法家思想中“尽地力之教”的口号，尽管在需要开发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战略生产的时代不失为进步的思想主张，但在自然资源已得到高度开发，甚至存在资源枯竭危机的时代就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了。因此，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资源与适度开发、节约使用辩证统一的和谐生态观与均衡发展观。这方面，儒家历来提倡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和谐用中”的思想主张正合时宜，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帮助我们树立有利于人类永续性发展的生态观与发展观。

在中国经济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走向现代化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弊端。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诚信缺失，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里面，虽有信用制度不健全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不重信誉、不守信用、不讲职业道德的问题。这与儒家的“诚信”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必然起着破坏性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向民众特别是经营者、管理者大力宣传诚信的内涵、意义及其对于提升道德良知、导正社会风气、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儒家“中庸”思想的根本要义就在于坚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思维模式，即把握全面情况而推行“中道”，以造福人民。在一个存在

极端主义、霸权主义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上,推行中道是化解矛盾冲突、造福各国人民的最佳选择。阿富汗、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已经证明武力征服主义的失败,中美关系从对立走向求同存异的合作可以说是中道的胜利。我们可以预言,在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的 21 世纪,解决诸如中东问题、伊朗与朝鲜核问题、亚洲国家的领土争端等等问题,只有通过公正务实、平等协商的和平谈判途径,即实行中道的办法才能真正获得解决。我相信,儒家的中庸之道,将在沟通两端、化解冲突、建设和谐世界新秩序方面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从而成为普世性的价值观。

总之,儒学中以仁爱、和谐、诚信、中庸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有着其他文化价值观系统无法代替、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就是充分发挥儒学作为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重要一员的作用,发挥儒学作为提升人类道德素质、展现人生意义、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开展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①的思想教育。这“八荣八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新概括,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也体现了儒学“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可以说,这“八荣八耻”中的每一条,都打上了传统“礼义廉耻”文化的烙印,如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团结互助、诚实守信、艰苦奋斗诸条目,体现了儒学仁爱、民本、和谐、诚信、自强不息的价值导向。这有力地说明了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魅力与现代价值。不久以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出“中华文化在 21 世纪将拿什么贡献给世界”的问题,言下之意是中华文化已经拿不出新东西贡献给全人类了。这是一种杞人忧天式的“中华文化无为”论。其实,我们应该坚信,绵延五千年不曾中断而且不断创新的中华文化是有强

^① 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2006 年 3 月 4 日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发表的讲话中提出的,其具体内容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它决不会在 21 世纪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缺席或失语。随着中国在 21 世纪的经济崛起，必然出现一个中华文化繁荣复兴的新局面。中华文化在 21 世纪所能贡献于世界的，将不仅是类似长城、故宫、兵马俑那样的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仅是可以教授若干外国学生以汉语、汉文的几百所“孔子学院”，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核心价值观念（例如仁爱、民本、和谐、诚信、中庸、忠恕、节俭等等），将伴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全球化”而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民所了解、所认同，从而成为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到那时候，我们的中华文化将会以平常、平等的心态立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而不是以自卑自贱或自高自大的姿态跻身于“文化列强”之中。须知，随着全人类文明素质的提高，21 世纪的世界文化格局将日益呈现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和谐互动的局面。在这个文化格局中，儒家的和谐文化将在多元文化互动中起到某种促进沟通的调节作用，从而为未来和谐世界的构建贡献自己的智慧。

然而，我们在强调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时候，切切不要陷入民族自大心的怪圈。当讨论儒学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时，必须将儒学放到现代多元文化格局中去认识，应当清醒地看到，儒学只能在多元文化格局中起到一元的作用，尤其是在推行道德教化、矫正世道人心、坚持民本民主方面不可或缺，但不要试图以儒学包打天下，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儒教国家。那种因为中国和平崛起、文化复兴就误以为 21 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从而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论、“中国文化世纪论”或“东方文化世纪论”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独断主义的，在实践中则是为别有用心者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张目，因而是十分有害的。须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本性上是和谐主义的中庸文化，而不是扩张主义的侵略文化。它追求与其他文化的和谐相处、取长补短，而非统治或压倒异质文明，这正是“和而不同”的真谛，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岂有他哉！

实证主义与近代中国

上海社会科学院 何錫菴

内容提要:中国的学术思想,在近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在依傍西方学术思潮的过程中进行的。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充分展现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分析实证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传播与中国人对其的认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学术的演变过程,寻找中国学术在哪里转了向,变了形,以期为建构不再依傍西方的中国学术作出有益的思考。

一、实证主义与西方哲学

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起源于西方文艺复兴,在自然科学领域它强调观察和实验,要求知识的确定性、实证性。“实证”(positive)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 *positivus*,意为“明确的”、“精确的”、“直接的”、“无疑的”、“确定的”、“确实的”、“肯定的”等等。这就是要求科学以实验、实证为取向,因此被称为实证科学。

实证科学是经验的、客观的和反思辨的。随着实证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科学研究从搜集材料的阶段进入到系统理论思维的阶段。科学本身的发展为解决哲学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提供了新的思路。19世纪初,法国的圣西门首先将实证科学方法推广到哲学上,把 Positive 这个词演化为 Positivism,即实证主义,亦称实证论。后被孔德所采纳,用于指称一种哲学。孔德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说,即第一阶段为神话与宗教迷信阶段;第二阶段为哲学形而上学阶段,最后是实证的科学阶段。各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思想方法,即神学方法,用神圣的